

第一編

新天下主義

第一章

新天下主義與中國的內外秩序

影響二十一世紀世界最大的事件，可能是中國的崛起。伴隨着國家實力逐漸擴大，中國的內部秩序與外部秩序卻出現了日趨嚴峻的緊張局勢。在國內，國家的強大並沒有吸引邊疆各少數民族對中央的向心力，反而在西藏、新疆不斷發生民族與宗教衝突，甚至出現極端的分離主義和恐怖活動。而在國際關係領域，中國的崛起讓周邊國家惴惴不安，東海、南海的海島之爭令東亞上空戰爭烏雲密布，隨時有擦槍走火的危險。不僅是中國，整個東亞各國的民族主義意識都十分高漲，呈相互刺激之勢。猶如十九世紀的歐洲，局部戰爭的可能性正在增加。

危機的腳步臨近家門，我們有化解危機的方案嗎？治標的國策固然可以開列一張清單，但重要的乃是根除危機之本。這一本源不是別的，而是自十九世紀末引入中國的民族國家至上意識，這一意識如今已經成為從官方到民間的宰制性思維。民族主義本是現代性的內在要求，然而一旦成為君臨天下的最高價值，將會給世界帶來毀滅性的災難，就像曾經發生過的世界大戰一樣。

真正的治本之方，需要一種與民族國家意識對沖的思維。這一思維，我稱之為「新天下主義」，一種來自古代傳統，又重新加以現代性解釋的軸心文明智慧。

一、天下主義的普世性價值

何謂天下主義？在中國傳統中，天下具有雙重內涵，既指理想的文明秩序，又是對以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空間的想像。

列文森指出：在古代中國，「早期的『國』是一個權力體，與此相比較，天下則是一個價值體」。¹作為價值體的天下，乃是一套文明的價值及相應的典章制度。顧炎武有「亡國亡天下」之說，「國」不過是王朝的權力秩序，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明秩序，不僅適用於一朝一國，而且是永恆的、絕對的和普世的，國家可亡，但天下不能亡，否則將人人相食，成為霍布斯式的叢林世界。

當今中國民族主義、國家主義思潮如此高漲，背後乃是一種「中國特殊論」的價值觀。似乎西方有西方的價值，中國有中國的價值，所以中國不能走西方的邪路，要走中國特殊的現代化道路。這種論調，看起來很愛國，很民族本位，卻是最不「中國」，最反傳統的。因為中國的文明傳統不是民族主義，而是天下主義。天下的價值是普世的，人類主義的，而不是特殊的，某個具體的民族或國家的。無論是儒家、道家，還是佛教，都是雅斯貝爾斯所說的古代世界的軸心文明，就像基督教、古希臘羅馬文明一樣，中華文明也是以全人

類的普世關懷作為自己的出發點，以人類的價值來自我衡量。當近代中國從歐洲引入民族主義之後，中國人的胸懷從此狹隘了許多，文明也因此而萎縮，從人同此心、心同此理的天下氣魄，矮化為「那是西方的、這是中國的」小家子氣。毛澤東當年還講「中國要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」，「無產階級只有解放了全人類，才能最後解放自己」，民族主義的背後有國際主義的大視野。而如今的中國夢，只剩下一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了。

固然，古代中國人除了講天下，還講「夷夏之辨」，然而，古代的夷夏，與今天掛在極端民族主義者嘴邊的中國／西方、我們／他們的二分思維是完全不同的，今人的二分思維受到近代種族主義、族群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影響，夷夏之間、他者與我們之間是絕對的敵我關係，毫無通約、融合之餘地；而古代中國人的夷夏之辨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種族概念，而是一個相對的、可打通、可轉化的文化概念。夷夏之間，所區別的只是與天下價值相聯繫的文明之有無。天下是絕對的，夷夏卻是相對的，血緣和種族是先天的、不可改變的，但文明卻可以學習和模仿。誠如許倬雲先生所說：在中國文化之中，「沒有絕對的『他者』，只有相對的『我者』。」² 歷史上有許多用夏變夷，同化蠻族的例子，同樣也有以夷變夏、化胡為華的反向過程。漢人本身是農耕民族，而胡人多為草原民族，農耕中國和草原中國經過六朝、隋唐和元清的雙向融合，因此許多胡人的文化已經滲透進華夏文化，比

如佛教原先是胡人的宗教，漢族的血統裏也摻雜了眾多蠻夷的成分。從服飾到起居，中原的漢族無不受到北方胡人的影響，比如漢人最初的習慣是席地而坐，後來喜歡上胡人的馬扎，從馬扎發展為椅子，最後改變了自己的習慣。

中華文明之所以歷經五千年而不衰，不是因為其封閉、狹窄，而是得益其開放和包容，不斷將外來的文明化為自身的傳統，以天下主義的普世胸懷，只關心其價值之好壞，不問種族意義上的「我的」、「你的」，只要是「好的」，通通拿來將你我打通，融為一體，化為「我們的」文明。

然而，今日極端之民族主義者，視中國與西方為絕對的天敵，以種族和民族的絕對分野抗拒外來的文明，甚至連學術界裏，也流行着一種「西學原罪論」，只要是洋人的東西，就一概拒絕，不必討論。他們判斷是非、善惡和美醜的標準，不再有古人的普世尺度，只剩下「我的」狹隘立場，似乎只要是「我的」，就必定是「好的」，只要是「中國的」，就是無須證明的絕對之善。這種「政治正確」的民族主義，看似是弘揚中華文明，實質是將普世的中華文明貶低為一國一族之特殊文化。文明與文化不同，文明關心的是「什麼是好的」，而文化只關注「什麼是我們的」？文化是將「我們」與「他者」區別開來，解決自我的文化認同，而文明不一樣，文明要從超越一國一族的普遍視野回答「什麼是好的」，這

個「好」不僅對「我們」是好的，而且對「他們」也同樣是好的，是全人類普遍之好。在普世文明中，沒有「我們」與「他者」之分，只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價值。

中國的目標如果不是停留在民族國家建構，而是重建一個對全球事務有重大影響的文明大國，那麼她的一言一行、所作所為就必須以普世文明為出發點，在全球對話之中有自己對普世文明的獨特理解。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，不能用「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」、「這是中國的主權，不容別人來說三道四」這類慣常語自我辯護，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標準來說服世界，證明自己的合理性。中國作為一個有世界影響的大國，在今天要實現的不僅是民族與國家的復興夢想，而且是民族精神的世界轉向。中國所要重建的不是適合於一國一族的特殊文化，而是對人類具有普遍價值的文明。對中國「好的」價值，特別是涉及到普遍人性的核心價值，也同樣應該對全人類有普遍之「好」。中華文明的普世性，只能建立在全人類的視野之上，而不是以中國特殊的價值與利益為皈依。中國文明在歷史上曾經是天下主義，到了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，天下主義如何轉型為與普世文明相結合的世界主義，這是一個文明大國的目標所在。

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，是黑格爾所說的負有「世界精神」的世界民族，理應對世界承擔責任，對傳承「世界精神」承認責任，這個「世界精神」，就是在普世價值形態出現的新天下主義。

二、去中心、去等級化的新普遍性

談到天下主義，周邊國家總會談虎色變，擔心隨着中國的崛起，昔日那個驕傲自大、威震四方的中華帝國會起死回生，捲土重來。這樣的擔心不是沒有緣由的。傳統的天下主義除了普世性價值外，還有地理空間的含義，即以中原為中心的「差序格局」。天下由三個同心圓組成：第一個是內圈，是皇帝通過郡縣制直接統治的中心區域；第二個是中圈，是帝國通過冊封、羈縻和土司制度間接加以控制的邊疆；第三個是由朝貢制度所形成的萬邦來朝的國際等級秩序。從中心到邊緣，從化內到化外，傳統的天下主義想像和建構了一個以華夏為中心、蠻夷臣服於中央的三個同心圓世界。

在中國歷史上，無論是漢唐宋明的中原漢族王朝，還是蒙元滿清的邊疆民族王朝，在其空間擴張的過程中，既給周邊地域和國家帶來了高級的宗教和文明，同時也充滿了暴力、征服和柔性奴役。在今日這個尊重民族平等、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時代，如果有誰還試圖重新回到以華夏為中心的等級性天下秩序，不僅意味着對歷史的反動，也只是一廂情願的夢囈而已。因此，天下主義需要在現代性的脈絡中予以揚棄和更新，發展為天下主義的2.0新版。

新天下主義「新」在何處？與傳統天下主義相比，新天下主義有兩個特點：一是去中心、去等級化；二是創造一個新的普遍性之天下。

傳統的天下主義，乃是以華夏為核心的同心圓等級性權力／文明秩序；新天下主義首先要割棄的，是這一中心和等級化秩序。新天下主義的所謂「新」，乃是加入了民族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。在新天下秩序中，沒有中心，只有相互尊重獨立和平等的民族與國家，也不再是支配與被奴役、保護與臣服的等級性權力安排，而是去權力、去宰制的平等相處的和平秩序。更重要的乃是新天下秩序的主體發生了變化，沒有華夏與蠻夷之分，不再有主體與客體的區別，誠如古人所云：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。」在新天下主義的內部秩序中，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在法律和身份上相互平等，尊重和保護不同民族的文化獨特性與多樣性；而在國際的外部秩序中，中國與周邊及世界各國不分大國、小國，相互承認與尊重獨立的主權，平等對待，和平共處。

民族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，乃是一種「承認的政治」，相互承認彼此的自主性與獨特性，承認各自民族的本真性。以「承認的政治」為基礎的新天下主義與傳統的天下主義不同，傳統的天下主義之所以有中心，乃是相信處於中心的華夏民族秉承天命，其統治天下的合法性來自超越的天之意志，因此有中心與邊緣之分。在現今這個世俗化的時代，每個